

2月2日2020年

## DOS UPDATE #6 -- 命名的意义

### 政府隔离设施汇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三名（NUS）学生于今日被要求在国大隔离区（GQF）接受隔离。

三名学生目前均情况良好，无任何症状。

其中，两名学生分别于1月23日和26日自湖北返回新加坡，他们的隔离期将分别于2月7日和2月10日结束。另外一名学生于今日返回新加坡，将接受隔离至2月15日。

### 三名隔离学生即将入住的隔离房间



国大隔离区将配置：

1. 打扫用具及个人卫生用品



## 2. 个人福利包（包括食物、饮用水）



## 3. 无线上网设备

亲爱的同学们：

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应当怎么称呼当前的这种病毒。最初我觉得应该称呼它为 2019-nCov 新型冠状病毒，然后将其改为“武汉病毒”。第二天，我又决定改回原来的命名，并一直用到了现在。

命名的意义有着其深远的含义及影响。

为什么美国金融危机被叫做次贷危机，而亚洲金融危机却有“亚洲”两个字？

一种解释是，这是习惯用法。但是，在开始时，我们并没有固定的名称，所以它是可变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命名其实“无关紧要”，就像开车应该在马路的左边或右边一样——一旦定下来了，人们自然会跟随。

但就目前而言，我更倾向于使用 2019-nCoV 这个名称，原因如下：

首先，病毒命名不应牵涉到任何地名，特别是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它为全球卫生紧急状态之后。

其次，这个名称目前不会造成任何沟通上的障碍。诺贝尔奖物理学获得者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十几岁时就掌握了微积分，并在解题时使用自己的数学符号。但最后，为了和其他更多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们交流，他还是选择了遵从惯例，使用了通用的符号。

2019-nCov 被世界卫生组织规定为公共卫生危机，这也是我们目前要遵循的规定。

最后一个原因我很难用简短的回答来解释，它源于我之前和一位同学的邮件交流。

亲爱的梁教授：

我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名学生。在 UTown 上课时，我和朋友看到了许多中国学生在校园。今天下午，我们坐在一群学生旁边，他们在喧嚷之余，其中两个人不但大声咳嗽，甚至没有用手捂住嘴或佩戴口罩。

据我所知，学校已经反复强调，从中国回来但不进行自我隔离的学生会被处罚。但是，现在正是春节之际，学校又如何确保校内学生不是刚从中国回来的呢？校园里人太多了，的确让人无法尽信他们并非刚从中国回来。

学校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确保学生遵守了隔离规定？学校有方法追踪学生近期的外游记录吗？

新加坡目前所有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均来自中国，而且其他国家也已经出现人传人的病例。学生不太可能遵循隔离指示，并且鉴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能力，仍然允许他们在校园中随意走动将使校园成为疫情大规模爆发之地。

我十分担心我的朋友，以及全校所有教职员工的健康。我希望学校能采取更多措施去确保需要接受隔离的学生遵守隔离指示，并且不会在校园里随意走动。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对病毒进行围堵措施。仅仅依靠学生的自觉是不够的。

M 诚笔

亲爱的 M：

感谢您的来信：

### 1. 关于国籍

我刚给停课隔离的学生们送完晚餐回来。他们当中有一些是中国人，但也有一些来自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如你所知，病毒可以由世界各地的人传播，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国籍的人。

### 2. 行为本心

学校确实制定了非常严格的隔离制度，并且禁止学生违反——你可以参考我之前的邮件。

在这些措施当中，你会发现我们不仅希望学生们做正确的事，而且还希望他们以利人利己的方式行事。与被发现患病后马上停学的风险相比，社交隔离 14 天所带来的不便相对较少。

### 3. 在线学习

作为学生事务处主任，我应该对你负责。以上这些回复是想表达我理解你的苦恼。如果你很担心上课带来的风险，你也可询问你的授课老师是否可以采用在线学习的方式。我之后的邮件会具体告诉你们这方面应该怎么做，我也相信学校的老师们会乐意帮忙。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信息，学生事务处副主任 **Eldin Lim** 教授会告诉你更多有关学校如何应对目前公共卫生挑战的细节，他也会更加详细地解答你的疑问。

祝你新学期一切顺利。

亲爱的梁教授：

感谢你的回复。

我很感谢那些从疫区回来之后选择了自我隔离的同学们。他们很有诚信和责任感。但是，学校必须在发现学生没有自我隔离后，才会对相应的学生做出立即停学的处罚。因此，我们当下又怎么知道在校园里随意走动的学生不是刚从中国的主要受染地区回来的呢？

我知道我们需要在 **Luminus** 上申报我们的外游记录。但实际上，自我声明和检疫措施取决于学生的诚信，我们不能完全相信那些受影响的学生会接受自我检疫。

学校是否有其他可靠措施，可以真正地核实他们的旅游记录呢？我认为，只有检查学生的护照或者移民局证明是最可靠的方法。病毒本不分国籍，但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杜绝其根本。

谢谢你。

亲爱的 M：

你提出了重要的想法。我也同意你关于“源头”的观点，并且觉得应正视检查护照的事项。从概率而言，我们实际已经更加关心自中国和湖北返回新加坡的人员。因此，我们是根据旅行记录而非根据国籍来分类。如果我们不依赖自我申报，那么我们就应该检查每个人的护照。

新加坡国立大学是一个社区，但不是一个封闭的社区——学生在新加坡各地往来，与不同国籍的人交往。

这既是社区生活的意义，也是风险。

我们采取合理的措施控制传播，制定了很多方式抑制和惩罚违反规则的人，但是学校不能，也不想提供零风险的架构。

我知道这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我们的分歧来源于我们看事物的角度不同。我们都认同个人行为应适当被限制，学校也应当保护学生。

你认为，在目前的风险水平下，应该采取更多措施，包括严格检查护照。当然，我认为如果情况的严重程度升级，我们可以做得更多，包括全面采取在线学习。即使是现在，如果发生泄密事件，我们也会检查护照。

但是我认为在任有的风险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检查学校里所有人的护照。  
我理解你对公共卫的担忧。如果你觉得你不想来上课，请与副主任 Eldin Lim 教授联系，他会协助你。

希望我解决了你的担忧。另外，我也在回复你的同时，也对此事件得以反思并受益良多。

亲爱的梁教授：

谢谢你的回复。

我们应当采取强有力的控制措施，确保应当被隔离的人接受隔离，我们也需要真实客观的行程记录，而不是自我申报。当生命受到威胁，现在不是考虑政治正确性的时刻。

亲爱的 M：

感谢你同意我们公开这篇部分编辑后的邮件往来记录。

即使在正常情况下，我都没有时间“政治正确”。但是当生命受到威胁时，我们需要各种形式的“正确”——医学上的、技术上的和道德上的。这包括我们对概率逻辑和偏差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

所以，我是基于道德的正确性，而不是政治的正确性来回复你。学校必须要让所有人以同样的目光对待每一个学生——不是以护照的颜色，而是对每个人一视同仁。

在我第一次给你的回信中，我说过作为学生事务处主任，我应该对你负责。同时，我对所有学生都负有同样的责任——因此，正如伊曼努尔·康德所说，我有责任绝不把任何学生仅仅当作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是始终同时把他们当作他们自己的终极目的。

此致，

副教授梁菁

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事务处主任